

中文教学的历史维度： 周质平先生的文史研究与中文教学

邹昕

摘要

在美国中文教学的许多方面，周质平先生都曾开风气之先。他过去四十年来的许多改革与尝试，对中文教学界今天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学界在对“明德模式”、“普北教学法”的分析中已多有论述。本文则侧重于周质平作为中国文史研究者的这一面向，从他的文史研究与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回顾他在中文教学上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周质平在晚明文学与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对“语文改革”这一议题的探讨，指出他多年来对于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与发展的持续思考，为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维度。第二部分呈现的是周质平文史研究视野下的中文教学，论述周质平如何经由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在具体的语言教学里回应他本人在文史研究中始终关心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周质平 美国中文教学 近代中国语文改革 明德模式 普北班

邹昕，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系、中文语言项目，联络电邮：xin.zou@nyu.edu

本文之成，须要特别感谢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梁霞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彭涛博士、耶鲁大学张永涛博士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吕珏博士拨冗阅读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使我获益良多。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批评指正。彭涛博士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王玎老师分别为我核对了二稿，修正了不少文字上的讹误。文章初稿曾有幸在普林斯顿第29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上宣读，会后收到过多位同行学者的反馈与鼓励，在此谨致谢忱。文中若仍有错误与不当之处，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引言：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1924年，胡适(1891-1962)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到：“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表明自己对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说法的激赏。这个说法，后来也常被视为胡适对他本人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的定位。在北美中文教学的许多方面，周质平先生都曾“开风气之先”，从教材的编写，到教法的确立，他旗帜鲜明，同时又能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既开风气亦为师”的。他当日的许多改革与尝试，都深刻地影响了中文教学界今日的面貌。关于这一点，学界在对“明德模式”、“普北教学法”的分析中已多有论述。本文则侧重于周质平先生作为中国文史研究者的这一面向，从他的文史研究与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入手，回看他在中文教学上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希望能为中文教学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

在学术研究上，周质平早年着力于晚明文学，后以胡适及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名世。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袁宏道与晚明公安派)。(Chou, 1998) 这本书是时任“剑桥中国史”主编 Denis C. Twitchett 杜希德(1925-2006)所主持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的一本。今天回头看，Twitchett 无疑是位巨眼英雄，因为这套丛书可以说提携和培养了整整一代学人。当时入选丛书的中青年学人，很多日后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巨擘。除了周质平以外，还有牛津大学的 Glen Dudbridge (杜德桥)、剑桥大学的 David McMullen (麦大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 David Knechtges (康达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Victor Mair (梅维恒)、斯坦福大学的 Ronald Egan (艾朗诺)、普利斯頓高等研究院的 Nicola Di Cosmo (狄宇宙)，以及在中国学界为大家所熟知的黄仁宇、王汎森、黄进兴、陈弱水等学者。而这部丛刊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推动并见证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paradigm)的一次转向，完成了从“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蜕变。(孙英刚，2012, 页 27-30)

如果细读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会注意到, 就材料而言, 周质平所处理的, 不外乎袁宏道的诗文、游记。但就眼光与方法而论, 他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小学与西方语文学 (philology) 的范畴, 而能打破古今界限检讨晚明公安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具体来说, 此前对于公安派的认识主要有两种: 在历史上, “公安三袁”常常被与晚明的“前后七子”对举。一般认为, 七子主“复古”, 而公安重“创新”; 七子讲“模拟”, 而公安言“性灵”。周质平则有意打破这种二分法, 指出公安派与前人其实“异中有同”; 晚近以来, 对“公安三袁”的认识又深受“五四”一代学人的影响, 经过周作人、林语堂、刘大杰等人的发挥与鼓吹, 袁宏道成了二十世纪的文化英雄, 是“白话文学”、“性灵”、“幽默”的代表。对此, 周质平则着重阐明晚明与“五四”其实“同中有异”。周质平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 不仅纠正了学界对晚明文学的固有看法, 也直接参与到了北美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中, 开一时之风气。

2021年, 这本书的中译本——《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在中译本的《自序》中, 周质平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我对公安派的研究兴趣起因于我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溯源……近年来, 我的研究与写作集中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 但早期这一段在晚明文学中的浸淫, 不但带给我无尽美好的回忆, 对我而言, 也是现代与传统衔接之所在。(周质平, 2021, 页2)

可以说, “衔接现代与传统”是贯穿周质平学术与教学生涯的一条主线。他日后在汉语教学领域的许多主张与实践, 在我看来, 仍然是延续这一思路而来的。

一、中文教学的历史维度：对近代中国语文改革的再检讨

今天的北美中文教学界都很熟悉周质平关于语言教学的几个提法，比如“听说领先，读写跟进”“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说”。这固然是周质平对赵元任(1892-1982)在上世纪40年代所开创的这一脉语言教学理念的提炼与重申(周质平, 2015a, 页90-95; 2015b, 页83-92)，实际上也包含了他个人几十年来对于近代中国语文改革的研究与反思。

“语文改革”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探讨的一大议题。所谓“语文改革”，包括了“语”(口语)与“文”(文字)两方面。在文体上，有“文白之争”；在语言上，有推进口头语共通的“国语运动”；在汉字方面，则有汉字的拼音化、简化等诸多方案。¹胡适发表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通常被视为“白话文运动”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语文的一大弊病——“言文背驰”(又称“言文分离”或“语文分离”)。简单地说，就是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文字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口语，因此也就无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与脉动。而胡适开出的药方，概言之，是以白话取代文言以实现“言文一致”/“语文合流”。

周质平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与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胡适的兴趣与熟稔是分不开的。在早年的公安派研究中，已能见出这一兴趣之所在。在论述公安派的现代影响时，周质平正是把公安派的理论与实践放在“语文合流”的大脉络下来考察的。以“语文合流”来观照晚明公安派，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此前欧美学界把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归因于英美“意象派诗人”的影响，而周质平对晚明公安派的研究，实际上是为“白话文运动”找到了本土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

1 “汉字问题”，包括近代语文改革中的“汉字存废”之争、汉字繁简问题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是周质平在“语文改革”这个大话题下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展开。他曾撰写多篇文章讨论汉字改革的历史与启示，如《汉字与汉语教学》(载《国际中文教育学报》第6期(2019年6月)，页41-64)《汉语教学的理念、内容与方法》(《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第2期(2018年8月)，页8-14)《普通话与简汉字在港台的困境与远景》(《国际中文教育学报》第三期(2018年6月)页41-57)《汉字繁简的再审视》(《读书》(2016年9月)，页62-68)《晚清改革中的语言乌托邦：从提倡世界语到废灭汉字》(《二十一世纪》，第137期(2013年6月)，页28-43)以及《为汉字说句公道话》(《万象》(2008年3月)，页129-140)等。

周质平也指出，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主张虽与晚明袁宏道多有暗合之处，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胡适是直接受到了公安派的影响。他推断胡适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读过公安三袁。在周质平看来，民初“白话文运动”与晚明公安派的关联，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而应该从二者对于“语”与“文”相关性的共同认知上去理解。（周质平，2021，页220）

如果说“语文合流”是大势所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语”与“文”应该如何“合流”。周质平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批重要人物的研究（包括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虽各有侧重，但“语文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经由这些个案研究，他实际上不断地回到了“语文应该如何合流”这一问题上来，并从不同侧面给出了他的思考和回答。

周质平的现代思想史研究是以胡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胡适是他研究最多，用力最深的人物。众所周知，胡适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把白话从田间草野推上了“文学正宗”的位置。这在保守一方看来固然是激进的，但透过周质平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白话阵营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白话的支持者中亦有相对持平、激进或保守的分野。周质平对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人的个案研究，事实上还原了白话文形成初期“众声喧哗”的真实状态，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与特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语文改革的问题上，钱玄同（1887-1939）要比胡适激进得多。他曾提出“废灭汉字”，而改用 Esperanto（世界语）。（钱玄同，1918，页350）如果说胡适以“白话取代文言”尚是在汉语内部进行的“改革”，那么钱玄同的主张则是彻底的“革命”。周质平特别提点，钱玄同也是最早指出胡适白话诗不够“白”的一位诤友，批评胡适“未能尽脱文言窠臼”。（周质平，2012，页168）当时一般批评家往往嫌白话诗“粗俗”、“鄙俚”——太过于口语，而钱玄同却恰恰认为胡诗的问题在于不够口语，这代表的正是白话阵营中更为激进的一派对于口语与文字关系的独到见解。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激进的还有赵元任。胡适日后在回溯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时，特别提到赵元任。胡适在195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白话文提倡之初，赵元任常对他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说“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觉得真是不够白。”（胡适，1952，页227-234）关于胡赵二人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对比，周质平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赵元任是个真正实行“我手写我口”的人，胡适所主张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到了赵元任的笔下却成了“有什么话，写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所谓“白话”或“语体”在赵元任的文字里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白话文的提倡上，胡适是“宣导者”（preacher），而赵元任却是“力行者”（practitioner）。就主张的提出来说，胡比赵早，但在语文合一的实践上，赵走的却比胡更远，更彻底。（周质平，2012，页131）

对“语文改革”的关注，使得周质平能够提点出赵元任在近代思想史与汉语教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在《美国中文教学史上的赵元任》这篇长文中，周质平回顾了赵元任在中文教学上的主张与贡献，尤其有趣的是，他把赵元任从口语入手教授汉语，视为中文教学界的“语体文运动”。（周质平，2015a，页90-91）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母语进行的改革，而赵元任后来的中文教学面对的则是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海外学习者，通常的研究者是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周质平的这个比方别具只眼，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语文改革中的一些议题，事实上还是未完成的命题，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周质平大概也是最早注意到赵元任在《中国话的读物》（*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1968）（Chao, 1968）里自创“Sayable Chinese”（“可说的”中文）这一说法的学者。赵元任要在“口语”（spoken,

colloquial) 之外别创出“可说的”(sayable)这一概念,是因为以“言文合一”为旗帜的“白话文运动”所生产出来的“白话”,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书面语言。胡适与鲁迅所写的白话文与口语的距离或许较文言稍近了一些,但还远没有达到与口语“合一”的程度。因此,赵元任所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无论是《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 1956) (Chao, 1956), 还是《中国话的读物》都力求尽量真实地记录与反映口语。在赵元任这里,“语文合一”的途径是让书面语向口语靠拢,理想的书面文字是口语的记录,这样,学生从书本里学来的每一句话,也都能转化成口语。

周质平对赵元任推崇有加,但同时,他对于赵元任主张中所显示出的白话文“口语化”倾向,也保持了相当审慎的态度。对此,他有两点富有洞见的观察:第一,赵元任早期的文字固然比胡适口语,但同时也比胡更“洋化”。第二,“可说的”未必就“可读”,也未必“好懂”(周质平, 2012, 页 132-136)。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书面语只是口语的转写,那么南腔北调的方言就要被落实为南北各异的书面文字。这样的书面语是难以超越地域限制的,也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学的文学”。

在白话文阵营里,林语堂(1895-1976)大概是偏“右”的,因为他不认为“文白”之间存在一种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周质平对林语堂的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林语堂代表了一种与胡适不同的“自由主义”面向,而从语文改革的方面来说,则是由于林为白话文的发展探索了另一条路。林语堂所主张的白话文,用周质平的话说,“减少了文言和白话之间断层的现象,加深了白话文历史的纵深和对文言的系联”。(周质平, 2018, 页 272)

在“语文如何合流”的问题上,如果说钱玄同与赵元任等人代表了一种以书面文字贴近口语的方向,那么林语堂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洗炼白话入文”(林语堂, 1934b), 书面语应该来自于口语,又高于口语。林语堂是这样概括他所提倡的“语录体”的:“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林语堂,

1934a, 页 750-752) 周质平特别指出, 林语堂的“语录体”表面上看来, 似乎拉大了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距离, 但实际上则是看到了白话文的发展必须突破口语的限制这一事实。

林语堂也有意打破“文白”之间的藩篱, 他多次提到, 他“深恶白话之文, 而好文言之白”。周质平把“白话之文”释为“文言的白话”, 是“看似口语, 实则恶性西化的文字”。而“文言之白”则是“白话的文言”, 是“浅近的书面文字, 明白晓畅, 而又不冗沓啰嗦, 没有排比典故, 但却典雅灵动”。对此, 他还作了一段富于辩证的阐释, 也可以视为他本人对于二十世纪“文白之争”的总结:

文字的死活, 不当以时间的先后论, 更不当以文白分。文字的死活体现在“达”与“不达”上。“达”的文字即使再古、再文, 它依旧是活的, 而“不达”的文字即使再新、再白, 它依旧是死的。因此, 我们觉得“辗转反侧”、“投桃报李”是活的,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是活的, 宋明语录是活的, 《水浒传》、《红楼梦》是活的。然而“在狂暴森冷的夜雨中, 一颗沉重、忧郁、破碎、饱经世故而又热切的心, 正在快速地堕向那地狱边缘, 不可知的深渊”却是死的。前者不以其古、其文, 而碍其为“活”; 后者却又不以其新、其洋, 而免于“不死”。(周质平, 2018a, 页 269)

如果我们对上述的研究略作总结, 就可以大略看出周质平在语文改革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一方面, 他认为“言文合一”是晚近以来中国文学的大势, 也是中国语文生命力之所自来。另一方面, 他意识到追求言文的绝对合一有矫枉过正的危险。他特别指出, 言文之间的距离是与中国语言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 “中国的方块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它与拼音文字最大的不同, 就在表意文字无法忠实而全面地反映口语”。(周质平, 2018a, 页 268) 他特别提醒我们, 言文距离的存在, “既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必要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 恰恰使

书面语可以超越口语、方言与地域限制，获得“普遍性与可懂性”，成为维系民族国家内部一体性的有力纽带。

周质平考察晚清到民初的白话文发展，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白话文的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口语化，越来越“白”，而是经过了一个“文”化的过程，也就是白话文脱离口语、俗语而走向书面语的过程。他特别提示读者注意，如果比较晚清时期的白话（如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和胡适主编过的《竞业旬报》）和民初《新青年》上的白话，会发现真正取代文言的，正是《新青年》上这种被赵元任认为不够“白”的白话。（周质平，2018a，页272）周质平理想中的书面语，我想大略可以概括为一种“有白话文的明白，而无其冗沓；有文言文的简练，而无其晦涩”的文体。²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看周质平的述学文章和他所撰写的高中年级汉语教材，很能见出这种旨趣。

对于中国近代语文改革的研究，不仅成为了周质平在教学上诸多主张的出发点，也为汉语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维度。作为文史研究学者，周质平所关注的，是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对象——现代汉语，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未来又将向哪里去的大问题，是在“教什么”、“怎么教”之前的“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

二、文史研究视野下的中文教学

在了解了周质平对于近代语文改革的研究之后，再回看他在中文教学上的理念与实践，更能见出背后的精义。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教法的贯彻，周质平所依据的，不只是语言习得的一般规律，也有他个人在晚近中国语文改革史中的所见所思。

普林斯顿大学的初级中文课最初是由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教授在 1957 年秋季开设的，用的是赵元任的《国语入门》，继承的也是赵氏由口语入手教授汉语的办法。这个路径，经由

² 这是周质平对于鲁迅白话文的评价，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的语言是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见仁见智。此处只做一般性的概括，而不是要以鲁迅的文字作为理想的白话文典范（周质平，2012，页22）。

陈大端、周质平的主持，唐海涛、杨玫诸先生的辅翼，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贯彻和光大。“听说领先，读写跟进”在周质平这里不只是一个先后的问题，也是主从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对于“听说领先，读写跟进”的坚持，已经从当初的“引领潮流”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坚守底线”。在2014年出版的《中文起步》的序言里，周质平回顾了過去三十年北美中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他特别指出：在西方二语习得理论和教学法的影响下，对外汉语的教学重点由传统的句型、句法操练转向了语言实际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听说能力的训练受到重视，这也使得赵元任“听说领先”的原则成了教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同时，在交际、功能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对语言基础（语音、语法、词汇）的训练又显得有些过时，甚至保守了。（Chou, Wang & Lei, 2014, p.vii）在层出不穷的新理论与新潮流面前，周质平选择了坚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套教学法经过了几十年实践的检验，成果丰硕；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于晚近“语文改革”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语文合流”这一大势的判断不无关系。不重“听说”，或将“听说”置于“读写”之下，仍然是把语言与文字打作了两截，这正是过去一百年的“语文改革”所要改变的状况。

不过，对于“口说”的重视并不等于对“口语”的绝对服从。周质平曾明确指出“真实语料”未必就是最佳的语言学习材料：

我们似乎过分强调所谓“真实语料”的价值，而忽略了这些“真实语料”中夹带着过多不规范的结构，或不相干的话题……就教材的编写而言，相对于“真实语料”的，并非“虚构”或“人造”，而是在遣词造句上规范，在选题编排上有趣。（Chou, Liu & Zou, 2019, p.ix）

透过周质平的研究，我们看到白话文要继续发展，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文”化，而非一味“口语化”。这个判断也可以移用到汉语教学上来。近代语文改革并没有消除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距离，这是

今天的中文教学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在经历了初级的语言学习后，要求得语言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不能只向“真实”、“地道”的口语中寻，还需要有书面语的滋养。这也正是周质平在中高级汉语教学中所努力的方向。

周质平最早编写的两部教材——1990年出版的《胡适读本》和1992年出版的《中级现代汉语读本》——很好地反映了他在中高级汉语教学上的最初探索。今天回看这两部教材，会发现他日后在教学上的基本取径和理念，很多在这个时期已见雏形。《中级现代汉语读本》的序言是这样介绍这本教材的：

这本教材是为学过一年级中文的美国大学生而编写的。本书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富争议性，在文字上则力求平顺明白。课文的内容摆脱歌颂中国政治的老套，而以美国大学生活及中国当前政治、社会问题为讨论的对象。在情节发展上则尽可能地做到语言与生活的结合，并力求风趣；不勉强避开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而不甚雅驯的字眼。我们相信语言课文应该反映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拟的环境。(Chou & Chao, 1992, p.v)

可以说，“在内容上富争议性，在文字上则力求平顺明白”是贯穿周质平主编的所有教材的基本精神。内容上的争议性是为了激发学生开口说话的欲望，也唯有通过开口说话，书面的内容才能落实为口语。文字上的平顺明白、又力求风趣，不仅照顾到了这个程度学生的实际水平，从白话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现代白话文的正宗。

此外颇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不甚雅驯的字眼”所采取的不回避态度。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不避俗字俗语”的提法。与书面语相比，来自口语的成分都不免显得浅白俚俗，而所谓“不甚雅驯”，正说明这部分口语尚未被固有标准所规训，富于生机与活力。在2001年出版的《事事关心》里，周质平对此有进一步的

解释：“我们觉得，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都不妨教给学生。至于雅俗或格调之高下，则见仁见智，不必勉强求同。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话题是否都是得体而又高雅的。一定程度的‘不得体’正是真实和生动之所自来。”（Chou, Xia & Goh, 2011, p.xii）对于“不甚雅驯”的语言、“不甚得体”的话题的不回避，一直贯彻到了2019年出版的《我看中国》里。过去几年，在言论禁忌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坚持又多了一层“向舆论争自由”的意味。

周质平的第一部高级教材选取胡适的文章作为教学材料，这固然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关，也有语言与内容上的考量。他在前言中特别阐明了这一选择背后的考虑：

By reading Hu Shi the language student can not only be rewarded with important cultural insights but, because language used by Hu Shi is so suitable for language study, the student gains in this aspect as well. His clarity of expression, logical development of argument and understandable content make his essays ideal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he controversy that is so much a part of his writing encourages student enthusiasm and classroom debate, and stimulates exchange of opinion and argument... Although the book is called a “Reader” we suggest to student that the texts serve as stimuli for oral exchanges leading, we hop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creased student proficiency in presentation of argument in Chinese. 通过阅读胡适，语言学习者不但可以在文化上多有所见，在语言上亦将多有所得。胡适的文章明白晓畅，富于逻辑，内容平易，是非常理想的语言教学材料。同时，胡适文章的一大特点在于话题极富争议性，这正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课堂辩论，将大有益于不同观点的交流……本书虽名为“读本”，但是我们更建议学生作口头

交流之用，以真正实现中文论说能力的提高。(Hou & Chou, 1990, p.xiii。序言原文为英文，为方便阅读，此处笔者做了简单的中译，下同。)

以内容而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心人物，胡适的文章可以帮助学生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几乎一切重要命题。而以语言论，胡适的文章是清楚明白的“白话”，语言浅近又可供模仿，实在是难得的语言学习范本。周质平在序言里特别强调，这部教材虽然是“读本”，但最终的目标是要激发学生“口说”的兴趣，进而提高他们论说的能力。

在《胡适读本》之后，周质平又组织编写了一系列高级教材，很能显示出他在高年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念，其中有以现代思想史为选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省》(*China's Own Critics*, 1993)，有以“五四”时期及三十年代文选为主题的《中国的危机与希望》(*China's Peril and Promise*, 1996)，有以社会分析及幽默小品合编的《文学与社会》(*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99; revised edition, 2016)，也有以现当代学者文章集合而成的《中国的发展与困境》(*China's Development and Dilemmas*, 2018)。这些教材在选材的侧重上容或有不同，但共同点都是透过所选的材料，向学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学、历史和社会的知识，使学生不但能习得语言的结构和使用，也能有系统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相关知识和社会的变迁。换句话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高级”水平，在周质平的构想里既是语言水平，也是对现当代中国的认识水平。

在课本的选材上，周质平很早就有清晰的“文体”意识。他主持普大中文组之后组织编写的教材较之前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体的选择上，由小说转向论说文；在内容上，则由抒情的叙述转向充满争议的批评。”(Chou, Chiang & Chao, 1993, p. v)周老师曾戏言，他对中高级汉语教材的最大贡献，是换下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名篇,也是现代白话文的一篇代表作。这篇散文,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宣示了白话不但可以口说,也能写出“美文”,不但能达意,也能抒情,这是过去认为只有文言才能做到的事。与胡适以白话作诗一样,朱自清是要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来证明白话在表现力上绝不逊于文言,这在把白话文推上“文学正宗”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我们不妨以下面一段为例: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霏;透过这烟霏,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霏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隙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朱自清,1995,页3)

客观地说,这段文字对于景致与感觉的描摹是极其细腻而连贯的。结尾处化用了古典诗词里的意境而不着痕迹。如李陀所说,在白话文兴起的最初几年间,朱自清就已经把尚未定型的白话文写作推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是很值得敬佩的。³但是,对周质平来说,《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类文字,美则美矣,却不是理想的语言材料。

从文体上说,写景与抒情的体裁是最难引起讨论的。面对这类的美文,师生往往只能“微笑,默叹,以为妙绝”,此外并无话可说;而“无话可说”,在他看来,正是语言课的致命伤。这类文字或可做文学上的鉴赏,但对于语言能力的提高,帮助有限。从语言上说,朱自清此时的创作仍未脱“欧化”语言的影响,这一点从上面长串重叠的定语里可见一斑。语言虽是白话,却脱离了口语。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最终恐怕也不免要回到“言文背驰”的老路上去。

3 李陀先生在关于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的论述中对此有很多高明的见解,这里借用了李陀原文中讨论朱自清语言的同一段话,尝试做一些不同的发挥和阐释(李陀,2015,页173-174,感谢彭涛博士在阅读初稿后向我推荐了这篇重要文献)。

问题在于，拿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后，要换上什么样的文章？九十年代末期，周质平为刚学了一年中文的美国学生撰写了一系列质朴平实的文字，取名为《新的中国》。这些课文多是以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学生的口吻来写的，这就对语言和内容构成了恰到好处的限定。比如第15课《北京的夜市》里有这样一段话，正可与上面朱自清的那段文字对看：

后海是一个湖，原来是皇帝的花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京的皇家花园都一个一个地开放了，老百姓也都能进去了。晚上的后海特别漂亮，岸上的酒吧和湖里的游船都亮起了霓虹灯，还有人在船上唱歌。(Chou, Chiang & Eager, 1999, p.135)

这段话所写的，不正是桨声灯影里的后海吗？我不知道周质平在写这段话时，是否想起了朱自清，但我们仍不妨将这个片段看作他在教材语言上的一次新尝试：用最浅白的语言，做叙述、介绍、甚至描摹。更重要的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可读的文字，也是可说的语言。其实，这段文字里虽没有朱自清式的抒情，但并非没有一点个人的声音和情感。我们从这段叙述里看到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面对中国的新变，叙述者是欣喜的，甚至还有几分陶醉。

今天的语言课已经不太会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类文字了，但是周质平当日在取舍之间所面对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网络时代给中文教学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什么才是“好的语言材料”？我们对“好的语言”是否敏感，有没有足够的辨别力，也许仍然是可以反思的问题。从周质平主编的一系列教材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什么才是好的语言材料”有不懈的探索，也在不断地纠偏，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关于“五四”白话文是否可以作为对外汉语读本的前后几次讨论。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省》里，周质平对于教材语言有这样的一段说明：

就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的选材来说，在行文上，我们不避五四前后略带文言的白话文，因为这样的文体，在白话文的发展上，有其历史意义。我们觉得许多语言老师对文字的“及时性”未免太过敏感，只要看到一两个稍不时髦的名词，就说这些材料过时了。语言老师一方面固然应该注意到语言与时俱变的“变异性”；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忽略语言文字也有他的“稳定性”。“及时性”高的语言，“稳定性”往往偏低。（Chou, 1993, p.x）

“略带文言的白话”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林语堂所推崇的风格——有白话的明白晓畅而无其冗沓啰嗦，这或许是周质平当时期望于高级汉语学习者的。不过，他之后很快就意识到，对于水平不够高的学习者来说，读这类文字可能适得其反，不但不能收“文白互通”之功，反而可能造成一些“文白夹杂”、“半文不白”的蹩脚文字。有见于中高年级语言水平的断层，他在2001年出版了《事事关心》，并在序言中写道：

这些二十年代作家所写的白话文虽是现代汉语的典范作品，但这种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是很大的。要在这些作品中选出一篇真能“上口”的文字真是少之又少。被许多学校选为高级读本鲁迅小说选，对美国学生来说，哪里是“现代汉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既听不到也看不到类似这样的句子：“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鲁迅《野草·风筝》）。这样的句子，对一个对外汉语教师而言，既不是“现代汉语”，也不是“古代汉语”，它简直就是病句！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宗师巨匠，他可以写这样的“病句”，但我们却不能用这样的“病句”作为“样板”来教外国学生。（Chou, 2011, p.xiii）

上面的这个转变，也可以视为作为文史研究者的周质平退到了幕后，而作为语言教师的周老师走到了台前。周质平清楚地意识到学术价值与语言价值并不总是合一的。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倒向语言价值。这一点，对于一位浸淫于文史研究多年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周质平在古汉语教学中的理念与实践，也与他在近代语文改革上的研究密切相关。对于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他多有反省：

其实文言文绝非完全的“死文字”，而白话文也未必就是今人的“活语言”。这两种文体，如血肉相连，是很难划分清楚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能说明这两种文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周质平，《华夏智慧序言》（未刊））

为此，他对被“五四”一代学人视为“死文字”的文言做了一番创造性的解释。他说：“我们与其把‘死’字解释成‘死亡’或‘没有生命’，不如把‘死’字理解为‘固定不变’”。事实上，周质平之后对于古代汉语课程的设计与改造，就是沿着打破“文白对立”这一思路而来的。在教学理念上，他主张显示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联系，这样一来，古汉语课程的目标就不只是教会学生如何翻译，而是如何通过古汉语的教授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水平。在周质平看来，翻译（无论是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是翻译成英文）只是一种“decoding”（解码）能力，而不是语言能力，仍然是把古汉语当成了一种“死语言”。因此，他借鉴赵元任教授古汉语的方法，大量引入诵读、甚至口说，一定程度地把现代汉语教学中的“听说法”引入了古汉语教学，让古汉语也“活”了起来。（周质平，2015b，页 88-90）

在古汉语教材的编纂上，周质平早在 1997 年就曾撰文阐述过他构想中的一本面向外国学生的古汉语教材。在这个早年方案里，他提议打破“由古及今”（从先秦两汉的子史选文到明清散文）的编排顺序，转而从最接近学生语言水平的浅近文言开始讲授。在他的选文

里，既有梁启超“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民体”，也有以口语入文，幽默隽永的明清尺牍与小品。课程虽然名为“古汉语”，却处处提点着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显示出他沟通文白的尝试。（周质平，1997，页57-64）虽然普大后来的古汉语课程并未完全按照当年的这个构想开展，但如果细看普大的中文课程设置，会注意到在高年级语言课之上又设有“晚明小说选读”以及“现代思想史选读”。这样的设置，除了话题的考量外，也是因为这两门课所处理的语言材料分别是明清白话和二十世纪初的早期白话文。换言之，这两门课实际上构成了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课程之间的过渡与桥梁。让一个完整接受过普大中文教育的学生也能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史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或许是周质平在整个课程设置背后的用心。

从2015年起，周质平与王静、张永涛等几位老师编写了一本全新的古汉语教材，从教材到教法，多有尝试。就内容来看，这本教材以主题为纲 (theme-based)，涉及生死、人性、人伦、夫妇、男女等20个话题。每个主题下又以时间为线索，展示出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同一命题的回应。例如，在《老子》的“祸福相倚”之后是一篇《塞翁失马》，“名实”问题后则附上了苏轼的《日喻》。在“人伦”一章下，周质平选了《论语》中“孔子论直”一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之后又附上了《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中“直躬证父”的选段，以显示后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故事新编”来表述各自不同的立场。这种选文与编排方法，类似于“以传解经”的传统，在语言上可收重复练习之效，在内容上，又很好地显示了一个命题内部丰富的阐释空间。

透过这些选文，我们也不难看出周质平在学术上的一贯旨趣。以《孔子其人》一章为例，他向学生介绍的首先是《论语》中孔子的“夫子自道”，之后是孔门弟子在孔子死后对老师的追忆，最后则是司马迁《孔子世家》中的赞语。这样的编排，大致展现了孔子是如何一步步“由凡入圣”的，透露出一种历史的眼光。周质平在《孔子其人》中所要展现的，正是种种标签、层层建构之下，那个曾经有血有肉、

可亲可爱的孔子。

在《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后，周质平选了《鸚鵡救火》这则故事。《鸚鵡救火》本源于佛经，目前所见的较早版本是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不过，在版本的选择上，周质平并没有一味追求早出，相反，他选择了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因树屋书影》中的记载。这个选择大概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书影》的记载略去枝蔓，更为简洁，对初学者来说，是更容易进入的语言材料。另一方面，周亮工的这条记载经胡适、余英时引用发挥，已经脱去了最初的宗教意味，而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象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质平将“鸚鵡救火”视为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佳诠释。(周质平, 2019, 页 184-188) 类似的例子在这本教材中还有很多，无一不显示出周质平的用心。他所希望的，是透过古代语言的讲授，让学生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与精神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一些“温情与敬意”。周质平曾借是钱穆“温情与敬意”这一提法来说明他理想中的语言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周质平, 2018b, 页 16-21)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教材也构成了他尝试衔接传统与现代的又一次努力。

结语

哈佛大学明清文学荣休教授 Wilt L. Idema (伊维德) 曾为周质平的公安派研究写过一篇书评，在结尾处有这样几句话，非常值得注意：

It is a quite common tendency among scholars to overestimate the brilliance and importance of their object of study. It is therefore quite refreshing to read a study which in no ways debunks its subject yet squarely views him as a man of his age. 在学界，研究者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高估或夸大自己所研究对象的杰出与伟大。因此，当我们读到这样一本著作，它原

原本本地还原了历史中的人物，并不回避其历史局限性而又无损其杰出与伟大，实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Idema, 1990, pp. 128-130)

这段评论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周质平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一个精神——诚。周质平的研究与教学是诚实的，也是诚恳的。在研究取径上，他选择直面重要的问题，不回避，不取巧；对于研究对象，不美化，不拔高。他的全部追求，或许可以总结为一句“还其本来面目”。

周质平早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从异端到英雄：论晚近的李贽研究》，讲的是晚明文人文人李贽，一个明代思想的异端，如何因为偶然契合了后来一度流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普罗”等一系列话术，而一跃成为了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从下面这段文字中感觉到周质平当时的义愤：

写古人总要存着一个还他本来面目的用心。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但这番用心多少可以免去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为了现代的一个政治运动，把一个死了三百多年的古人拉出来当打手，做先锋，无论把他说成异端也罢，英雄也罢，对古人都是侮辱，而对读者却是欺骗。(周质平，1986，页204-230)

其实周质平不止写古人如此，他在四十余年的研究与教学中，始终保持着“还其本来面目”的本心。我想，这也正是一个学者“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基础。周老师在学术上的诚恳，还体现在他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提点上。他总是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试图用流行的理论和时髦的名词来掩盖自己问题意识的缺乏——被旧传统、老规矩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洋理论、新名词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挟“古”自重，挟“洋”自重，都是他所不乐见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胡适先生的名言，也是周老师过

去几十年来在研究和教学上的一贯主张与不懈追求。我想这一点，是他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胡适 (1952): 提倡白话文的起因, 《胡适演讲集》中册, 台北: 胡适纪念馆。
- 李陀 (2015): 《雪崩何处》,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林语堂 (1934年10月5日): 怎样洗炼白话入文, 《人间世》, 13。
- 林语堂 (1934年5月1日): 我的话: 语录体举例, 《论语》, 40, 750-752。
- 钱玄同 (1918):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新青年》4卷4号(4月15日), 350。
- 孙英刚 (2012): 杜希德的贡献在今天的意义——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谈起, 《汉学研究通讯》, 31 (2), 27-30。
- 周质平 (1986): 从异端到英雄——论晚近的李贽研究, 《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 台湾, 商务印书馆, 204-230。
- 周质平 (1997): 美国对外古汉语评议,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2(3), 57-64。
- 周质平 (2012): 《光焰不熄: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周质平 (2015a): 美国中文教学史上的赵元任 (上),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1) 90-95。
- 周质平 (2015b): 美国中文教学史上的赵元任 (下),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 83-92。
- 周质平 (2018): 《自由的火种: 胡适与林语堂》, 台湾: 允晨文化。
- 周质平 (2018a): 林语堂的文字风格, 《自由的火种》, 台湾: 允晨文化, 269。
- 周质平 (2018b): 中文影响我的一生, 《读书》, 9, 16-21。
- 周质平 (2019): 自由主义的薪传: 从胡适到余英时, 林载爵编, 《如沐春风: 余英时教授九秩贺寿文集》, 台湾: 联经出版社, 184-188。
- 周质平著、康凌译 (2021): 《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 北京: 中华书局。
- 周质平, 王静、张永涛、陈剑飞、吕翔 (未刊): 序言, 《华夏智慧: 古代汉语类编读本》。
- 朱自清 (1995):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选集》, 香港: 文学出版社。
- Chao, Yuen Ren (1956).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San Francisco: Asian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c.
- Chou, Chih-p'ing (1988). *Yü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Chao, Der-lin (1992). *Intermediate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中级现代汉语读本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Chiang, Joanne and Chao, Der-lin (1993). *China's Own Critics: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省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Chiang, Joanne, Eagar, Jianna (1999; revised 2011). *A New China: An Intermediate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新的中国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Xia Yan and Goh Meow Hui (2001, Revised, 2011). *All Things Considered: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a* 事事关心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Wang, Jing and Lei, Jun (2014). *First Step: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中文起步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ou, Chih-p'ing, Liu, Jincheng and Zou, Xin (2019). *Eyes on China: An Intermediate-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我看中国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u, Sharon and Chou, Chih-p'ing (1990). *The Hu Shi Reader: An Advanced Reading Text for Modern Chinese* 胡适读本 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 Idema, Wilt L. (1990). Review of 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T'oung Pao*, 76, 128-30.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h-p'ing Chou'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nd His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ZOU, Xin

Abstract

Professor Chih-p'ing Chou is a pioneer on the many fronts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in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is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the landscape of this field. Previous studies have already pinpointed his lasting impact, notably the “Middlebury Model” and the “Princeton-in-Beijing Mode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e initiated or continued to develop. This paper now approaches Chou's ideas and practices i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is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 high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his career as an eminent and inspiring teacher-scholar. The paper first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Chou's studies on “language reforms”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argues that his unfailing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provides a much-needed historical dimension for today's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In light of his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paper's second part revisits Chou's ideas and practices i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Through a close look at his curriculum design, textbook writ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used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this paper seeks to show how Chou's language pedagogy reflects, and responds to those crit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hat have fascinated him throughout his sterling academic life.

Keywords: Chih-p'ing Chou,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guage Reforms in Modern China, The Middlebury Model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Princeton-in-Beijing

ZOU, Xin, Global China Studies,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